

中国传统师道的历史困境与突破

李怡哲

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徐家汇 200234

摘要：本文梳理中国传统师道从先秦起源、科举博弈到近现代转型的历程，剖析各阶段困境与突破。先秦私学奠定师道独立性，后遭汉代儒学官方化、魏晋门阀异化；科举时代师道与权力呈依附、疏离、对抗博弈，根源在“政教合一”。近现代，民国借新式教育续接师道，新中国以“强师兴教”重构，当代遇技术理性挑战。研究指出师道靠“隐性存续和显性转化”传承，当代需回归“德性启蒙”，为破解教师伦理困境提供参照。

关键词：中国传统师道；师道演变；结构性困境；近现代师道转型

前言

师道是传统教育核心，随政治、思想演变：先秦奠独立根基，后世陷依附、异化与功利困境，近现代续接转型又遇新挑战。本文以时间为轴，考察师道权力博弈轨迹，为应对教育异化、重构教师伦理提供镜鉴。

一、独立起源与困境萌发：师道早期的权力博弈

（一）师道独立性的根基

1. 私学兴起突破阶层垄断

中国传统师道奠基自先秦，其产生之初是独立价值体系。战国时期，社会动荡变革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，士阶层不断扩大，私人讲学之风也逐渐兴起。春秋末期，孔子开辟了教育下移的道路，创立私学，有教无类，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。孔子将师道定位为“修身以安人”的伦理使命，这是中国传统师道最早的也是最为深刻的体现。私学的兴起为师道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，儒家私学不仅传授知识，更注重道德教化与人格塑造，这种教育实践使师者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者，成为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的核心力量。

2. 道统自觉的思想建构

孟子提出“道尊于势”，“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殉道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”，强调士人应坚守自身道德与学术准则，不被世俗权力所左右，这一观点为士人伦理赋予了超越性定位，强化了师道独立性。荀子在孔孟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“师”的社会地位，“国将兴，必贵师而重傅”“有师法者，人之大宝也”，“师”是国家礼治、社会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，这是中国最早的“师”的社会定位。中国传统师道的演进主

要是以儒学之发展为线索，古代师道作为儒家义理的核心，在士人自觉中不断发展、传承，其独立性深深内化于每一个儒士的心中。

（二）政治收编的早期实践

1. 汉代儒学的官方化转向

秦汉时期，中央集权体制建立并逐步巩固，为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，政治权力开始深度介入教育领域，将师道纳入国家机器的运行轨道。汉武帝时期，采纳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。这也凸显了教育在维护政治秩序、强化统治权威方面的重要政治功能，师道开始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。即使如此，董仲舒以“天人三策”重构师道功能，既服务于皇权又暗含“屈君而伸天”的制衡逻辑，仍保留批判性。

2. 魏晋门阀制度下的教育异化

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，官僚大多以经术起家，累世公卿的状况逐渐形成，门阀世族逐渐垄断了九品中正制，造成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的局面。在门阀制度下，教育从“传道授业”异化为门阀巩固政治特权的工具，师道沦为门第传承的工具。教育从“传道”走向了“谋位”，教育目标窄化，教育功能趋于功利。

门阀垄断教育的情况下，部分士人进行了隐逸避世的文化抵抗，疏离门阀教育体系，以隐逸姿态维护师道精神。士人对政治依附的疏离姿态，展现了师道精神的韧性，为后世书院教育埋下伏笔。

二、制度催化与博弈升级：科举时代的结构性困境

在传统社会，师道作为教育领域的核心价值与规范体系，其存续与发展始终无法脱离政治权力的影响。当

教育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性工具，师道与政府的权力博弈进入了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困境，不断形成了依附、疏离、对抗等复杂多样的关系模式。

（一）依附模式：科举制下的共生机制

在权力与师道的博弈中，依附模式较为常见。此模式下，教师职位设立与职责履行受政治权力严格控制，教学内容符合官方意识形态，以培养符合统治需要的人才为目标，师道自主性被政治权力吞噬。

唐代科举制度的推行进一步加剧了师道的工具化。科举以诗赋取士的方式，迫使教育重心转向文辞训练，教师的角色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，逐渐沦为“文辞训练师”^[1]。宋代朱熹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定为科举标准，表面强化“道统”，实则使师道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。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，师道的核心精神被弱化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功利化。明清时期，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极致，八股取士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，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被严格规范。这种官学体系的僵化，使得师道在体制内陷入了深深的困境，难以实现其应有的教育价值。

（二）疏离模式：科举异化的反向突围

在科举制度主导的功利化教育体系下，部分士人通过主动疏离或被动边缘化的方式，再度重构师道精神的独立性。这种疏离模式既是对科举异化的反抗，也是师道精神在困境中突围的创造性实践。书院的产生，是儒家知识分子在“政教合一”传统下开辟的新道路，是通过制度创新建构独立文化权威。这种疏离模式虽未彻底摆脱权力羁绊，却为中华文明保存了批判性精神火种。尽管明清时期师道发展受到科举制度的严重裹挟，但民间教育依然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。民间塾师们通过蒙学教材，将师道的精神和文化内涵传递给下一代。这种非正统的知识传播，突破了科举对教育内容的垄断，成为疏离模式下师道精神存续的草根路径。

科举重压之下，师道虽陷入工具化深渊，但其民间实践仍维系着文化火种，为师道的传承提供了一线生机，这种疏离并非消极逃避，而是通过重构教育功能与知识生产体系，实现师道精神在权力博弈中的韧性传承，使得师道精神在底层得以坚守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（三）对抗模式：科举腐败的冲突形态

在科举制度的历史进程中，“对抗模式”集中体现为士人群体通过政治批判与制度革新，试图突破结构性困

境，重构师道精神与社会价值的伦理实践。这一模式既包括对科举腐败的伦理抗争，也涵盖改革派与保守势力围绕教育功能的理念冲突。自科举制度施行以来，舞弊问题时有发生，这充分暴露了由主观评价标准导致的权力寻租问题。八股文标准化的矛盾性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困境。一方面，程式化答题确实能减少舞弊；另一方面，过度依赖形式公平导致教育异化为应试训练，反而背离了师道的传道本质。

对抗模式的本质是士人群体在“道统”与“政统”博弈中的自我救赎，也揭示了师道精神在历史困境中的韧性。

师道与权力的互动呈现三种典型模式，反映了不同历史情境下的策略选择。在师道与权力的长期博弈中，这三种模式交替出现、相互影响。师道的权力博弈本质上是文化自主性与政治集权的冲突，这种困境的终极根源，在于中国传统社会“政教合一”的治理模式。然而，其批判精神始终以隐伏状态存在，成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。

在漫长历史进程中，传统师道无疑在历史困境中不断挣扎。师道的精神传承并非简单的线性延续，而是通过隐性存续与显性转化的双轨路径来实现。师道精神的隐性存续以体制夹缝为土壤，依托士人对道统的坚守悄然生根。显性转化则以现实危机为导引，通过价值符号的再编码与教育功能的创造性调适破土而出。显隐二者构成了传统师道在权力场域中的韧性生存机制，而更深层次的精神动力，则源自于士人群体以“道统守护者”自居的伦理自觉，这种身份认同在千年历史长河中持续为制度性突围输送精神能量。

三、断裂转型与范式重构：后科举时代的师道转型

（一）民国时期：制度断裂与精神续接

1905年科举制废除，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断裂，更是传统士大夫阶层与政治权力纽带的瓦解。但师道精神在变革中通过新式学堂与西学体系的融合得以延续。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校，将师道使命从传统的“治国平天下”转向“培养现代国民”，实现了传统师道与现代教育目标的嫁接。随着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，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精神世界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。蔡元培提出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倡导“五育并举”^[2]；张伯苓亲历甲午惨败，目睹“国帜三易”之痛，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念，构建南开教育体系^[3]；李建勋专注师范教育，主张教师应兼具儒家气节、国民意识与强健体

魄，秉持“道艺并重”理念^[4]；陶行知成长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，接受过传统与西方教育的双重熏陶，提出“生活即教育，社会即学校”理念，推动教育的平民化与大众化^[5]；……

民国时期的教师群体也展现了独特的风貌。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情谊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“从游式”教育模式的典范，在知识传授之外，更注重思维范式的传递，强调思想传承而非人身依附^[6]；傅斯年“叛师”投身新文化运动，则彰显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的现代学术伦理^[7]；周作人“谢本师”事件，通过公开断绝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，将师道对抗从科举时代的政治博弈转向思想立场的抉择，成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标志^[8]。这些事件反映了民国时期师道在传承与变革中的复杂性，尊师之道于新时代中注入了新的内涵。

（二）强国开拓：制度重建与师道重塑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开启建设征程，教育目标转变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，师道传承实践进入教育兴国的新历史阶段。

孟宪承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驱，毕生倡导“教育救国必先强师”，他提出“高师应向综合大学看齐”，注重师范性与学术性并重，开创了师范教育独立体系^[9]；萧承慎在战乱时期完成《师道征故》与《教学法三讲》，在《师道征故》中，将“师道”细分为教师的“为师之道”、国家和社会的“尊师之道”以及学生的“求师之道”，指出师道核心在于为师之道^[10]；陈桂生深入挖掘古代学者的师道思想，进一步对师道概念进行辨析，将师道进行广、狭之分，并且在西学东渐浪潮中客观剖析我国古代师资文化，为后续师道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基础^[11]……这些教育家的师道实践，夯实了新中国的教育根基，开创了师道传承助力社会主义建设之新局面。

（三）现代困境：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教育迈入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教育强国建设阶段。随着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发布，教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，师道精神在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引领作用愈发凸显。广大教师群体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力量，不断以多元实践赓续师道精神。

于漪作为人民教育家，成为践行师道的先锋代表。于漪从教逾七十年，坚持“为师先立人”原则，其示范并塑造的是“一个挺直脊梁的、大写的中国人”；她倡导全面育人，强调教育的民族性，培养学生的“中国

心”；她认为教育是增强人的精神力量的过程，致力于培养有责任感、有创新精神的公民^[12]。于漪的立人观、教育观及教师观构成了她的为师之道，她对“为师”及“何以为师”的践行，全方位地展现了师道精神在当代的生命力与影响力，激励着后辈更多教师去探寻教育真谛。在教育强国的号召下，传统师道也有了更多元的阐释，越来越多的教育家、教师不断接过师道的时代接力棒。

然而，新的时代有新的困境，传统教育理念与现代社会的冲突、技术变革、社会价值观变迁等因素都在影响如今的教育生态。当代教育继承了科举“公平竞争”的内核，却陷入了更复杂的异化，依附模式再现；人工智能与在线教育的普及打破了教师对知识的垄断地位，冲击教师“知识权威”，教师从“权威讲授者”转向“学习引导者”。教师权威的弱化甚至失效，导致师生关系的疏离，传统尊师之道也在慢慢消解。在新时代的师道困境当中，诸多教师也在探寻各种方式捍卫师道，在应试困境中，部分教师转向STEM教育、项目化学习，试图突破应试框架，重构师生共创的学习共同体。黄大年、张桂梅等案例凸显师道精神向“德性启蒙”转型，前者以学术报国情怀感染学生，后者以“拿命办学”的大爱重塑乡村教育伦理。这种“生命影响生命”的模式，呼应韩愈“传道者”本质，成为对抗技术异化的精神堡垒。

在技术理性主导的今天，师道的核心价值应从“知识传授”转向“德性启蒙”。“传道授业解惑”，首要的便是“传道”，在现代教育语境中，需重构“传道者”角色，在人工智能时代侧重批判性思维与价值观引导，回归教育育人本质，延续“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”的教育真谛。

结语

中国传统师道历经先秦奠基、科举博弈至近现代转型，始终以“传道”守教育本质，虽遇异化与挑战，却凭“隐性存续和显性转化”韧性传承。当下，面对技术理性冲击，师道需回归“德性启蒙”，继承“道尊于势”自觉，平衡学术与社会服务，方能破解教师伦理困境，为教育强国建设与民族精神传承注入动力。

参考文献

[1] 李弘祺著. 学以为己——传统中国的教育上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03: 123.

[2] 汤广全. 自由与和谐——蔡元培“五育并举”观研究[J]. 教育学术月刊, 2009, (01): 38-42+55.

[3] 侯杰, 李净昉. 张伯苓与中国人心灵重建再探析[J].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版), 2020, 22(04): 28-37.

[4] 张彬, 唐晓明. 李建勋的高等师范教育思想[J].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, 2003, (03): 62-65+6.

[5] 魏波. 民主教育: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核[J].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, 2015, 36(04): 97-104.

[6] 罗尔纲. 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2.10.

[7] 刘宜庆主. 浪淘尽 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[M].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0.08: 49.

[8] 张礼永. 大学之师与启蒙之师谁可谢——1933年上海文坛关于师道问题论争的回顾与探析[J].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, 2014, 13(06): 84-88.

[9] 刘海燕. 孟宪承与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办学探索及其时代价值[J]. 教师教育研究, 2023, 35(06): 107-113.

[10] 萧承慎. 师道征故[A]. 教学法三讲[C]. 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09.4.

[11] 陈桂生. 我国以“师道”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师资文化的合理性刍议[J]. 中国教育科学(中英文), 2021, 4(03): 47-50+141.

[12] 吴国平著. 师者于漪 教师学视野中的人与道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23.06.